

# 心智生态 民族生态 与国家共和

□ 文 / 纳日碧力戈

国家同一，民族多样，这本来就是客观事实。但是，自民族国家概念传播全球，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”似乎已成为某些人挥之不去的理想模型。“民族等于国家”的提倡者不是将民族置于国家之下，而是让它们完全重合，国家就是民族，民族就是国家。这完全是非生态的思维方式，不符合当下现实，也不符合未来愿景。

今天中国的五十六族共生格局是各民族互为环境，互守尊严，互相尊重，在互动协商中形成的民族生态。中国是民族共和之国，中华是民族众多之华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定义。



内蒙古草原·曾经的勒勒车  
已经成为旅游观光的景致

## 非生态思维的起源

中国古代典籍《尚书》和《国语》有“绝地天通”的记载，被称为“史话”：太古时代，人神混杂，民可登天，“人人萨满”。后来颛顼帝派重黎二臣“绝地天通”，天官地官分司天上和地下的事务，其中天官管理通天降神，地官管理土地民人。从此，民人不能在天地之间自由通行。用隐喻来说此话，“绝地天通”之后，“上智下愚”成为思维定势，“改天换地”的思想也盛行起来。上下对立，人要征服自然，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牢牢绑定了“现代人”的社会习惯。

近代世界兴起资本主义革命，商品经济强化了“绝地天通”，家族、部落衰落，阶级、国家取而代之，社会“暴力”开路。但是，“主义”如何与物质实践相结合，始终成为挥之不去的老问题。近现代中国或从英美、或从苏俄引进革命思想，自上而下发动社会革命和文化改造，颇有摧枯拉朽之势，一夜之间天翻地覆。但是，精神革命并没有解决物质需求，于是便出现解决物质需求的问题。费孝通先生说，中国先有机械文明传入，后有信息文明加入，两个文明叠加在一起，都需要成熟。同样道理，现代民族观和民族共同体模式进入中国，也存在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漫长过程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导致忽左忽右的摇摆，而域外列强的挤压，也不允许传统的生态理念重新注入实践。

不过，当代中国毕竟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了，绝大多数人过上了富裕的物质生活。此时，费孝通先生就曾不失时机地提出过“人富了之后怎么办？”的问题。他认为过去是“科技兴国”，未来会是“文艺兴国”。文艺的本质是“美”的感觉，是直觉的“韵”，是“气韵”，是“形韵”，是“神韵”。如果说“神韵”是生态思维的精髓，那么“形韵”就是生态万象的表征，而“气韵”就是形神二韵的钩连了。我们的时代呼唤生态思维的“神韵”，呼唤形气神的“三韵生态”。

## 从认知失序到生态危机

“绝地天通”反映了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垄断，而对于天地沟通的控制，也象征了人类“精英”与自然世界的对立：“改天换地”由此开始。过度自信的“人定胜天”，实为“认知失序”，因为它遮蔽了“天人合一”的本然，“绝地天通”的“智者”位尊权重，无所敬畏，在天地、人神之间“设卡”。

这种自大与自信的背后，是违反生态规律的认识危机。

举蒙古高原为例，草原生态系统安全为万物共生的第一要素，牧民世代积累经验，选育适应当地条件的优良畜种，不仅体现了人地（草）和谐，也发展了一种形神相通的文化情愫。其正如敖仁其教授所说，“优良畜种与草原生态系统之间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”。然而，近半个世纪以来，人们在短期效益的驱使下，以牺牲草原生态安全为代价，引进外来畜种，对畜群做人工杂交改良。表面上的自信，实际上反映了认知失序。根据研究，太阳辐射对草原畜群的生物进化有极强的胁迫力，蒙古高原的年日照时数长达2600—3300小时，使本地畜种具有耐寒耐热的超强适应力。多数畜种的毛色为黑色，有利于吸收阳光，有利于在冬春季节调节体温，也有利于抗寒。蒙古绵羊的头部、眼眶、腿部多呈现黑色或棕色，有助于防止太阳辐射和体温调节。此外，本地畜种的生理禀赋使它们能够在冬季生出厚密的皮毛层，蒙古双峰驼的驼峰、绵羊的大尾巴、山羊和牛的腰脂层、马的肩胛和囊膈等，都有效储备热能；绒毛中大量存在的空心毛，可应对低温和暴风雪的袭击；蒙古畜种体格稍小，“胴体粗壮，耳、腿、脖颈、尾部短小”，“这样的体型都有利于抵御严寒，减少体热的散失，都是适应严寒生态环境的生理调节机制。”然而，在“游牧落后论”的作用下，某种程度上，人畜地天和谐相处的传统在一些地方被抛弃，草原生态系统的特点被忽视，无节制的配种改良被大规模推行。

当然，生态环境以多元共生为特征，多畜种并存也是这个特征的一部分。“在适宜圈养的地区，有计划地实施配种改良，本身就是一件合理的决策，”而本地牧民也有培育本土化杂种牛的经验 and 积极性；牧民并不反对畜种改良，也不是没有能力掌握圈养式牧业作业技术，“他们比我们某些决策人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看得更远”。

草原生态系统耦合出相应的生态伦理。“天父地母”，生态环境是牧民生存一部分，也是生命的一部分，就像欧洲萨米人把自己比作太阳和风的儿女。他们不需要把道德关怀伦理学扩展到生态领域，因为伦理和生态原本就已经交融一体。在内蒙古草原有这样一个传说：一个小孩问“我们蒙古人为什么总是迁徙，就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？”母亲回答说，长期定居会让地母神疼痛，游牧让她的血液流通，感到舒服。草原培育了游牧文化，游牧文化是草原的精神支柱。

天然草原和游牧文化是内蒙古真正的两大优势，两大优势的结合，书写出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篇章。牧区的草木、动物、牧民，“经过千万年磨合形成不可分割的网络系统”，“他们是草原的主人”，“欢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到来，但要纳入草原系统，要成为草原的普通成员而不是霸主”。违反自然生态系统规律的认识失序，会导致“人定胜天”的一系列盲目行动，最终造成生态危机。以“人定胜天”的自信，大规模无序开荒，破坏了砂砾地表和保护性植被，沙丘堆积，掩埋草原和耕地。乌日陶克套胡教授指出，近代历史上，对于草原的过度开垦不仅造成生态危机，也造成社会各种矛盾激化。我同意生态学家刘书润教授的观点：虽然“围封禁牧”被认为是靠自然力恢复退化草场

的好办法，并且在内蒙古及其他牧区推广，但它不一定总是能够带来完美效果。除了草场喜忧参半的状况，其社会作用也有值得忧虑的地方。刘书润教授举阿拉善左旗为例，自2002年退牧还草以来，尽管国家投资近10亿元，牧民个人也耗费多年积累，而国家重点保护的畜品种双峰驼由25万峰降至8万峰……绒山羊的命运更惨。

在刘书润教授看来，游牧生活方式是游牧文化的载体，游牧生活方式消失，游牧文化也会随之消失；由此伴生出现的，可能是禁牧户失业率、失学率、离婚率的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
## 建设和修炼心智生态

从今天中国人面临的食品安全危机、饮水安全危机、空气质量危机等基本生存危机来看，调整认知方式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，已经迫在眉睫，刻不容缓。

防灾减灾的第一步是建设和修炼心智生态，或者勿宁说是恢复心智生态，重通地天，有所敬畏，有所自觉，变“改天换地”的任性为形气神钩连的生态依存，即不要把任意性的符号(symbol)混同于生态性的指号(sign)，符号有任意性，指号有生态性。本文说的符号指抽象约定的符号，指号不仅包括抽象符号，也包括具体征象，如感冒了要打喷嚏，热了要出汗。生活世界里充满抽象，也充满具象，需要神，也需要形，更需要气。

灾害人类学家安东尼·奥利弗·史密斯指出：“灾难隐喻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许多过程和事件”。一方面，由自然和社会交互作用造成的灾难，“因政治、社会和经济惯性及制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传导和分布”；另一方面，不能单纯把灾难单纯看作是社会建构，也不能看作是“纯自然”。社会、文化、认知与自然之间的互动，会造成自然和社会交融作用下的风险，即“脆弱性”，它直接影响到人们预期和应对自然灾害并从中恢复的能力。

人类抵御灾害的脆弱性不仅仅来自灾害本身，也与意识形态、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某些因素有关。人口、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断对人类及自然的生态系施加压力，使之陷入危险状况，这些非自然因素能够和自然灾害结合起来制造灾难。

灾害和灾难不仅仅是一厢情愿的设计，即任意抽象的符号游戏，而是尤其无情的“物质蛮力”，充满人的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和触觉。它们会在真正意义上带来伤害，剥夺生命，造成痛苦。灾害和灾难不仅仅是符号言说，它们还是物质“行动”。希腊罗马时代区分 sign（自然指号）和 symbol（语言符号），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指号是“物象”(sign of the thing)和“心印”(print in the mind)的相合一致，具有全人类的普适性。语言符号主要由“能指”(signifier)和“所指”(signified)构成，属于约定俗成。不同文化群体的施指-所指关系各不相同，具有民族特殊性。自然指号中多用蕴涵关系：如果A，则B，或者举例来说就相当于“如果感冒，就打喷嚏”；而语言符号用全等关系，即A等于B，或者举例来说就相当于“感冒等于打喷嚏”。问题在于，感冒会打喷嚏，但不完全等于打喷嚏，因为过敏也会打喷嚏。“绝地天通”就是用“A等于B”代替“如果A，则B”的过程，也是符号取代指号的过程。“A等于B”的思维方式属于“一厢情愿”式的信心十足，政策设计者会用“A等于B”的思想来指导实践，导致需要“未图谋”的后果。例如，金钱固然会给人们带来幸福，但金钱并不完全等于幸福。所以，有人开玩笑说，“金钱不是

内蒙古大草原



万能的，但没有金钱万万不能”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当中仍然有不少人信奉“金钱就是一切”。

比较而言，指号是物象、意义和交流的“生态系”，兼顾自然、社会与心智；而符号是约定俗成的自足系统，不与社会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权力发生直接联系。显而易见，指号理论更加适合心智生态和民族生态的研究，因为它兼顾形气神，兼顾物象、交流、意义。

传说六祖慧能遇到两位和尚争论风动还是幡动，他上前点化道：“不是幡动，也不是风动，是你们二位心在动。”但是，如果无幡无风，也就无心动。这是形气神关联的最佳例证。

在近些年的人类学研究中，形物、生物、身体等“物性”是理论抽象所不可缺少的要素，与“地天通”中的“地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们需要让符号回归指号，进入“生态”，接地气，融形意。“天地通”很重要，它是“元生态观”的再现和全新的提升。关爱他者，听山河歌唱，观万物律动，对差异喜闻乐见，避免“一厢情愿”，避免画地为牢——这是生态智慧的真表达。防灾减灾的必要前提是恢复心智的生态平衡，即让心智与物性对接，让形气神在美韵中钩连。

## 民族生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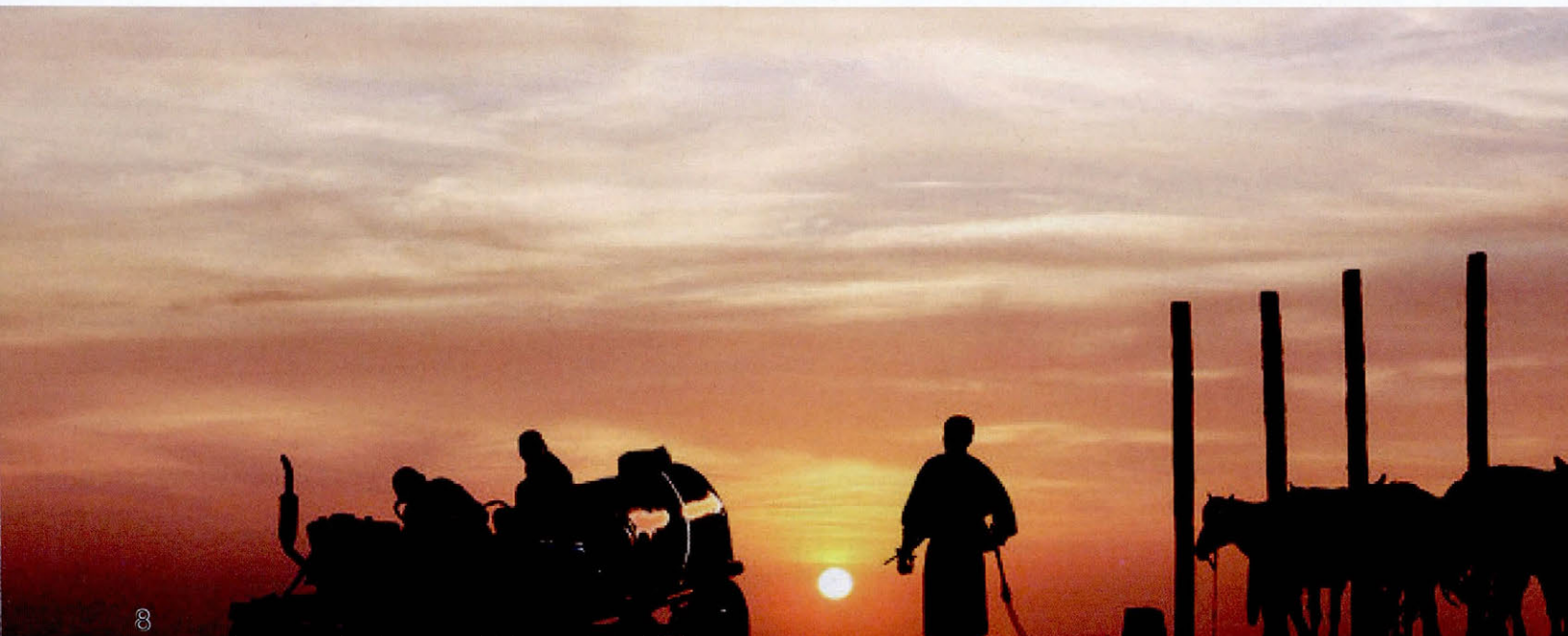
民族是人群的一种。从西方语言习惯看，“民族”是工业社会的产物，建设“民族”就是建设政治和经

济的“制高点”，而建立民族国家或者国民国家（皆来自英文 nation-state），更是革命者为之终身奋斗的目标。但是，在工业革命的热情高涨之后，人们开始反思既往的历史，发现了不少事与愿违的结果，例如贫富差距加大，道德滑坡，环境污染。作为后发现代化的“第三世界”，那些国家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痛苦，有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“后患”，也有如何让“西学”本土化的烦恼。

清代中国，民族分治，汉地用汉法，蒙地用蒙法，满、回、藏也各有变通，是近代帝国统治的例行做法。到了民国时代，政府虽有同文同种的努力，各族精英也各有打算，但“五族共和”仍是建国方略的基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从五族到五十六族，这都是政治协商、和谐互动的结果，绝不是无中生有。承认政治协商是现代文明的根基。群体不同，文化相异，个性突出，只有互相承认和尊重，各取所需，以政治协商开路，为利益互惠让道，才能有国家共和、人民同治。

回顾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“边政研究”，某种程度上多采取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，结果并不能团结民族，凝聚国人。当时的政府和内地精英，在观察和讨论边疆发展时，较少把自己也作为讨论对象，忘记了“边疆”的存在是由于“我”的存在，是由于“中心”的存在，也忘记了相对于“文化边疆”来说，“文化中心”也可以是“文化边疆”。阅读本民族文字书写的历史，听取本民族语言叙述的故事，讲述者本人就是主体，讲述者的文化就是“中心”，是“我”在此时此地书写和叙说，“我”来为时间和空间定位。

通过角色互换，通过人类学常说的“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”，通过“浓描”和“厚描”，我们就能深刻理解边疆发展的本质，看出其问题所在，知道如何制定战略，明白如何实施计划。例如，边疆地区生态多样，语言多样，思维多样，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多样，



这些本来就是实际情况，并不构成影响“安定团结”的因果链，并不因此给边疆发展带来必然的负面作用。然而，由于我们认知的局限，由于我们不能反观自己，由于我们不把自己作为环境的一部分，不把自己也看作他人的“边疆”，某种程度上我们会习惯性地把他看做“边疆”，把边疆看成是“问题”，把和我们相同的东西看成是“文明”或“进步”，把和我们不相同的东西看成是“落后”或“问题”。

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分属汉藏、阿尔泰、南亚、南岛、印欧诸语系，语言不同，饮食殊异，风俗多样，信仰有别。但是，他们自古以来就互相交流，互通有无。中原农区盛产粮食、麻、丝及手工制品，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畜力（牛、马等）；北方草原盛产牛、马、羊及皮、毛、肉、乳等畜产品，而缺少粮食、纺织品、手工制品等。中原与草原在经济上互有需求，形成农牧贸易的草原丝绸之路。起源于唐、宋的“茶马互市”，是汉藏民族之间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的贸易往来，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。在清代，就有汉族农民移入蒙古地区，开发农业。他们当中有不少由当初的“雁行”户，变为“依蒙古族，习蒙语，行蒙俗，入蒙籍，娶蒙妇”的定居户，并形成了众多的移民村落。

总之，民族生态自古存在，并非晚近才形成。

今天的五十六族共生格局来之不易，要倍加珍惜，用心呵护。就像自然河流弯弯曲曲而最终要奔向大海一样，各个民族互为环境，互守尊严，互相尊重，在互动协商中找到了“重叠共识”，形成了具有历史传承的民族生态，也建设了差异共生的政治空间——中国。

人类学家贝特森提出万物关联的生态观，指出人类其他生物乃至非生物，都生活在同一个超级生态系中，各种生命体和非生命体都能够互相关联，共生于同一个宇宙。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尚且能够共生，何况人类民族乎？

## 国家共和

工业革命初始，“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”曾经是某些社会先觉者的奋斗目标。但后来的历史证明，一族一国并不具有普遍性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。各个民族只能选择在同一个国家内共生共和，协商互惠，利益互补。

一族一国给人以错觉，似乎同文同种才能带来国家安定、人民和睦。但是，历史告诉我们，有时候同族战争带来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，并不比异族战争带来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小。差异固然会产生冲突，但差异也会带来和谐与和睦。从自然生态、心智生态到民族生态，无不充满这样的辩证。此外，差异也并不限于民族之间，同族之内的差异常常也会超过民族之间的差异，这是人类学常识。例如，中国北方各民族之间的综合差异往往小于南北方汉族之间的差异，饮食和性格方面尤其如此。

同一个国内存在民族差异实属正常，各民族要在政治文明的基础之上建设和守护共同的政治空间。同文同种的努力不仅是“一厢情愿”，更会带来连环恶果，带来不良的社会和历史的记忆，以及不断升级的族际冲突。各个民族有自己的核心符号和文化DNA，不分高低，不分尊卑，就像子女不会说母亲丑，母亲不会认为自己的孩子生错了。文化有价值，价值存感情，文化价值和民族感情只能承认它、尊重它，而不是消灭它、同化它。那么，不同民族如何和睦相处？答案是只能通过制度安排，以及制度保障下的族际交流、协商、共生，即“共和”。

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各民族协商共进的制度安排，是来之不易的政治成果，是国家共和的一个支柱。无论哪个民族，中国的国民都要在保持高度政治认同的前提下，互守差异，互爱尊严，互促和睦。

（本文作者为蒙古族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）

内蒙古草原上的“新景观”

